

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

主编 黄德宽

陈秉新

· 卷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

主编 黄德宽

陈秉新

· 卷 ·

412

181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陈秉新卷/陈秉新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5.4

ISBN 978-7-5664-0194-6

I. ①安… II. ①陈…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②汉字—文字学—文集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7082 号

AN HUI DA XUE HAN YU YAN WEN ZI YAN JIU CONG SHU

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

CHEN BING XIN JUAN

陈秉新卷

陈秉新 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240mm
印 张: 23
字 数: 372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ISBN 978-7-5664-0194-6

策划编辑: 康建中
责任编辑: 胡旋 张锐
责任校对: 程中业

装帧设计: 刘运来
美术编辑: 李军
责任印制: 陈如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65106311

总序

黄德宽

汉语言文字学是以汉语言文字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学科,这是一门渊源久远、积淀深厚的学科。对汉语汉字的研究,我国先秦时期即已肇绪,然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汉语言文字学,其历史大体上也只有百年左右。

安徽大学的汉语言文字学学科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才较快成长进步的。经过 20 多年的建设,目前这个学科不仅能培养硕士、博士、博士后等高层次研究人才,同时还成为全国高等学校重点学科之一,在教学、科研方面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

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发展和进步,是本学科诸多先生艰苦努力的结果,对他们的学术贡献我们不应忘记。总结发扬他们的学术精神和学科建设经验,是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推进学科持续健康发展的任务之一。因此,我们启动编纂了“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

这套丛书共 10 种,入选的 10 位教师是对本学科发展做出贡献的众多教师的代表,他们基本上是本学科各个方向的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各卷所收论文也基本上反映出各位老师的主要研究领域和代表性成果。除已经谢世的先生外,各文集主要由作者本人按照丛书的编选宗旨和要求自行选编完成。

在编纂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到底如何开展才是应该提倡的? 学科建设最为关键的要素到底有哪

些？对这些问题，我担任学校校长期间没少讨论过，时下我国高校关于学科建设的经验也可谓“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沉静下来，就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来看，我认为最重要的恐怕还是以下几点：

一是要以人为核心，尊重学者的学术追求。学者是学科的载体、建设者和开拓者。学科的发展主要靠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和以他们为主组成的团队。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学科建设思路，就要尊重学者，尊重他们的精神追求、研究兴趣和个性特色，最大限度地为他们提供自由发挥的空间，而不是用考核的杠杆和行政的手段迫使他们按设定的路径行事；那样很容易扼杀学者的研究个性和兴趣，也不大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高水平研究成果。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研究特色和重点，几乎都是各位教师自身研究领域的自然体现，他们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形成自身的研究风格，探索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因此能不为流俗左右，远离浮躁喧嚣，耐得住寂寞，甘愿坐冷板凳，最终取得累累硕果。

二是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教学科研相得益彰。大学最根本的职能是培养人才，这就决定了大学的学科建设必须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将教学、科研紧密而有机地结合起来。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教师，长期以来坚守在人才培养的第一线，他们将主要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人才培养上，而且大家都很热爱自己的教师职业，像何琳仪先生就是在讲台上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的。汉语言文字学学科近年来不仅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本科生、研究生，而且在汉语国际教育方面成绩突出，培养了许多外国留学生，在学校合作共建的孔子学院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翻看这些文卷，不难看出，将科研与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密切结合，用科研成果丰富教学内容，结合教学开辟新的科研领域，是汉语言文字学学科教师的共同特点。一个学科建设的成就，既要看科学研究，更要看人才培养。围绕人才培养的学科建设，应该是大学学科建设必须坚持的原则。这一点我以为是大学学科建设尤为值得重视的。

三是要日积月累，聚沙成塔。学科建设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人文学科的发展关键是学者队伍的集聚、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研究领域及特色的形成,更需要长期的努力。因此,开展学科建设不能急功近利,不能只寄希望于挖一两个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而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学科建设应该遵循学术发展的规律,通过创造环境、精心培育,让其自然而然地生长。近年来,许多高校将学科建设当重点工程来抓,纷纷加大投入,不惜代价争夺人才,虽然也可以见效一时,但是从长远看未必能建成真正的一流学科。这方面有许多教训值得记取。我校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成长,尽管也得到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支持,不过在实际建设中,我们还是坚持打好基础,通过持续努力,不断积累,逐步推进。我们深感,这个学科目前的状况离国内一流高水平学科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我们相信,只要遵循规律、持之以恒,其持续发展应该是可以预期的。

四是要开放兼容,培育良好学风。学科建设应该注重自身特色和优势的培育。强调自身特色和优势并不意味着自我封闭,而是要通过学术交流不断开阔学术视野,以开放兼容的学术情怀向海内外同行学习。我校汉语言文字学学科较为重视学术交流,各学科方向的带头人或骨干,先后在中国语言学会、中国训诂学会、中国文字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中国音韵学会、华东修辞学会、安徽省语言学会等全国和地区性汉语言文字研究的学术团体中兼任学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常务理事等职务,促进了本学科团队与国内同行的交流。同时,我们重视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不仅经常性邀请国内外学者来校讲学交流,还特聘著名学者参与学科建设,承担教学科研任务,逐步形成开放兼容的学科建设格局。丛书中收录的高岛谦一、陈秉新、李家浩三位先生就是本学科的长期客座教授或全职特聘教授。开放兼容的学科建设思路,其核心就是要将学科建设放在本学科发展的总体背景下,跟踪学术前沿和主流,形成学科自身学习和激励的内在机制,并确立自身的发展目标、特色追求和比较优势。学科建设要实现开放兼容,要注意协调和处理好学科内外部的各种关系,这不只是要处理好相关利益关系问题,还要形成学科发展的共同理想,尤以为重要的是

形成优良学风。优良的学风是学人之间合作共事的精神纽带。一个学科只有崇尚学术、求真务实蔚然成风，学科成员才能做到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相互兼容。良好的学风，也是学科赢得学术声誉、同仁尊重和开展合作交流的基础。这一点应该成为汉语言文字学科建设长期坚持和努力的方向。

人文学科有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最让人文学者神往的，当然是产生影响深远的学术大师，形成风格独特的学术流派。在当前社会和教育背景下，这好像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目标。但我以为，只要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遵循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规律，经过代代学者持续不断的努力追求，在一些有条件和基础的高校将来产生新的具有中国作风和气派的人文学科学派也不是没有可能。

我校汉语言文字学学科还有一大批默默奉献的教师和很有发展潜力的青年教师，他们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生力军。我相信，这套丛书的编纂出版对他们也是一个激励和鼓舞。见贤思齐，薪火相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和氛围，必将促进汉语言文字学学科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和进步。

2012年立春于安徽大学磬苑

前 言^{*}

我自幼即从父亲读书。1945年春父亲去世，经父亲生前友人介绍到马桥小学插班读五年级，读到高小毕业，因家庭经济状况不佳，无力升学，又继续在乡村私塾读书，直至解放。1951年9月，我经马桥乡人民政府介绍参加工作，先后在本县担任小学教师、《颍上报》副刊编辑、县广播站编辑、县评剧团编剧、中共颍上县委宣传部办事员。从1977年起，开始自学古文字学。1981年4月，调到省文物工作队（后改为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古文字研究工作。1983年9月，到吉林大学古文字教师研究班进修。研究班导师是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教授，授课教师也都是当代知名学者。1年的学习时间虽然短暂，但却给此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我治学道路上一个重要起点。

1987年，我担任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室主任，1991年3月担任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3月，经省社会科学研究系列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定为古文字学副研究员；1993年3月，经省社会科学研究系列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定为古文字学研究员。1990年，被评为文化厅系统优秀党员；1991年，被评为省直机关优秀党员；1997年，被聘为安徽大学教授。参加的学术团体有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中国文字学会、中国考古学会、楚文化研究会（先后担任副秘书长、常务理事、名誉理事）、安徽省考古学会（担任理事）。

我主要从事古文字研究，兼及音韵、训诂研究。从1981年至今，出版《汉语文字学史》（与黄德宽合著），合编《楚文化考古大事记》（撰写安徽、山东、江

* 编者按：陈秉新先生已于2007年元月不幸病逝，本前言是根据陈先生所著《自传》删改而成。

苏部分);在国家级和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9篇,20余万字。

发表的39篇论文,分为三类。第一类,古文字部分,计30篇。其中,有关文字学理论探讨方面的论文3篇,古文字考释方面的27篇。《论转注》是讨论文字结构规律的文章。“六书”中的“转注”是构字之法,还是用字之法,“转注”到底是一种什么构字方式,是长期争论、悬而未决的问题。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意声结构说”,认为“转注是以意符为首,配以声符,用以表示更加复杂、抽象的概念的构字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概括为意母孳乳法,造出的字是意声结构字(不同于形声结构字)”。该文曾获安徽省语言学优秀成果奖。

关于汉字的性质问题,一度成为文字学界讨论的热点。我在《汉字为意符示音文字说》一文中指出,传统的“表意文字说”以及近年提出的“表音文字说”、“方块拼符表词文字说”、“义素—音节文字说”、“意音文字说”、“意符音符文字说”,都不是对汉字性质的科学表述。该文从分析汉字字元意符及字元意符组合字记录汉语的特点入手,归纳出如下结论:“汉字记录汉语的方式,是以表意符号提示读音,独体字是以字元意符提示读音,合体字是以字元意符组合提示读音。”从而将汉字的性质界定为意符示音文字。文章认为:“给一种文字性质下定义,要注意文字系统的统一性。以上的讨论说明:从共时性来考察,不同结构的汉字是统一的;从历时性来考察,不同发展阶段的汉字也是统一的。它们都统一于汉字意符示音这一本质特征。”

古文字考释是文字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也是利用古文字资料进行其他学科研究的基础,历来为古文字学界所重视。我发表的27篇古文字考释文章,计考释出前人未释字和纠正前人误释字82个。如甲骨文中旧释为“麌”的那个字,我改释为“麋”之初文,从支、从彘字为声的字,释为古“揅”字。西周金文中常见的“圜”字,郭沫若释“纓”,唐兰释“圆”,均与字形不合。我根据“貂”字的字形演变,论定“𦥑”字即古“貂”字,“圜”则是“圜”之异文,不仅纠正了前人的误释,读通了相关文句,还解决了《说文》误“𦥑”为“貉”的千古疑案。寿县楚王墓出土铜器铭文中唐兰释“肯”的那个字,与古“肯”字字形不合。我改释为“前”,楚王禽前即楚考烈王熊元,与字形、音读均称恰适。舒城九里墩春秋晚期墓出土的鼓座,曾有学者将器名中第一字误释为“鑊”(鼎名)。我在《舒城鼓座铭文初探》一文中考释出器名二字为“雋鼓”,即晋鼓,并考定此器为复国之舒鸠君所作。该文曾获安徽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第二类,训诂学部分,计 8 篇。《从古文字学与训诂学的关系谈训诂学的发展》一文,从训诂学的内在联系,分析了古文字学与训诂学的关系。文章认为,古文字资料的不断丰富和古文字学的进步,为形训的科学化准备了条件,为义训探明源流提供了依据,为声训的发展拓展了新路,从而得出结论:吸收古文字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是训诂学取得突破性发展的关键所在。文章还提出了义训是“即义求义”,从字的本义,探求其引申义,为义训这一训诂方法的性质问题下了明确的定义。在 7 篇训诂专文中,还运用古文字资料与古文献资料交验互证的方法,解决了《诗经》“总角丂兮”、“茀禄尔康矣”,《论语》“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多见阙殆”、“思而不学则殆”,《孟子》“雉兔者往焉”、“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公孙龙子》“白马非马”,《史记》“颖脱而出”(旧多误为“脱颖而出”),《汉语大词典》不误,但注释亦误)等训诂难题。

第三类,音韵学部分,计 1 篇。清代学者孔广森及现代学者王力力主“东冬分立说”,在音韵学界影响很大,几成定论。于思泊师在《释𠂔、𠂎兼论古韵部东冬的分合》中肯定了清代学者王念孙“东冬不分”的主张。我在《古音东冬不分续考》中,列举大量谐声、异文、通假、韵读等音韵资料,进一步证成古音东冬不分说。

1995 年,我主动要求退休。此后,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工作,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主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出土淮夷史料研究”,参加者有李立芳同志。1999 年底,最终完成了《东夷淮夷史徵》(40 万字)的撰写任务,2000 年,经专家鉴定为 A 级,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于 2001 年 6 月批准结项。第二,参加安徽大学黄德宽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项目“商周秦汉汉字发展沿革谱系研究”,为主要撰稿人之一。

我在学术上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国家和社会却给了我很多荣誉。我虽已退休,还将竭诚尽智,不断求索,努力出更多更好的成果。

陈秉新

2001.11.8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编 古文字考释

释厃及从厃之字	(3)
释収及从収之字	(9)
古文字考释三题	(15)
释匱及相关字词	(29)
释𡇁、般、般及从𠁑诸字	(36)
释𩫔及相关字词	(43)
墙盘铭文集释	(52)
害即胡簋之胡本字说	(69)
铜器铭文考释六题	(76)
金文考释四则	(84)
寿县楚器铭文考释拾零	(94)
寿县蔡侯墓出土铜器铭文通释	(101)
舒城鼓座铭文初探	(114)
徐器铭文考释商兑	(124)
读金文札记二则	(132)
安徽出土子汤鼎铭文的再认识	(136)
安徽霍山县出土吴工叙戟考	(140)
包山楚简新释	(144)

包山楚简考释商榷	(151)
楚系文字释丛	(156)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补释	(165)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再补释	(169)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补释	(173)

第二编 文字学与说文学

汉字为意符示音文字说	(181)
论转注	(191)
《说文》与古文字互证分类例说	(200)
《〈说文〉笺证》选录	(222)
《〈说文〉笺证》选录(一)	(227)

第三编 音韵训诂与文献

古音东冬不分续考	(235)
关于“颖脱而出”	(255)
关于“颖脱而出”的训释	(257)
从古文字学与训诂学的关系谈训诂学的发展	(263)
大型语文词典吸收古文字学成果问题	(275)
“刍尧”、“雉兔”解	(281)
“白马非马”解诂	(284)

第四编 古文字与古史探索

殷虚征人方卜辞地名汇释	(293)
金文所见繇国考	(321)
徐舒源流初探	(326)
北赵出土铜器铭文中之晋侯忻及其他晋侯名新考	(334)
主要参考文献	(337)

附 录

生命的光华在字里行间闪烁	(343)
陈秉新先生碑文	(348)
编后记	(349)

第一编

古文字考释

释毚及从毚之字^①

甲骨文𠂇字，研契诸家隶定为“毚”，为了与训“篝筌”的“毚”（筇的异体）字相区别，我们隶定为“毚”。毚字在卜辞中凡三十余见，均用为殷王田猎活动的猎取对象，兹不赘引。甲骨文从毚的字有麋（作𦥑）和麌（作𦥑或𦥑）。麋字各家释“麋”，可信，只是对字形分析，尚有可商。对毚和麌字的释读，则争议颇多，迄无定论。本文重点考释毚及从毚之字，并对麋（甲骨文作“麋”）和“麌”（国的族姓、地望）作初步讨论。

毚字，罗振玉释“麌”，谓𦥑象鹿子随母形，殆即许书之“麌”字。《说文解字》训麌为“麌麌”，而别有麋字，训“鹿子”。然麌之为字，明明从鹿，会合鹿儿之谊，正是鹿子矣。卜辞以有角无角别鹿母子，故卜辞中之𠂇字似鹿无角，缘是亦得知为麌字矣”^②。

唐兰先生曾经指出：“罗氏误认从见之字以为儿字，故有此说。所谓卜辞以有角无角别鹿母子，亦其所臆测也。卜辞又有麋、麌二字，并从𠂇（今按：麌字从𠂇不从毚），罗氏于麋下则云‘麋殆似鹿而无角者’，是其自为矛盾之证也。”又说：“《说文》以麋为从鹿、困省声，籀文作麌。《诗》‘野有死麌’，《释文》作‘麌’，云‘本亦作麌，又作麋’。困与君皆声固无可疑，然《说文》以从禾为困省声则失之。殷世已有麋字，而麌、麋之字发生尚在其后，又安得因而省之哉。余谓麋字实从禾𠂇声，𠁧或𠁧之本字也……麋之本字以麋、鹿例之，实

① 编者按：原载《古文研究》第二十四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② 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中），1914年王国维手写石印本，1927年增订本。

当作𦥑，以无角别于鹿，亦象形字也。”^①

唐兰先生此说，除以为𦥑是“稠或穢之本字”疏于检查外，其余都是对的。可惜的是，他的正确意见未能得到古文字学界的普遍重视，有些论者仍然墨守罗振玉的误说。另有一些学者看出了释𦥑为“麐”（麋）的问题，改释为“獐”（麋）^②。然麋是獐（麋）的总名，麋兽之麋不得从麋。释𦥑为“麋”未顾及𦥑与𦥑的关系，其说实不可信。

我们认为对𦥑字的解释当从唐兰说。考《说文》：“麋，麋也。从鹿，囷省声。麋，籀文不省。”又：“麋，麋属。”（麋本作麋，《说文》学家已指出麋乃麋之误，今据改）唐苏颂《本草图经》云：“麋类甚多，麋其总名也。”晋崔豹《古今注》：“麋有牙而不能噬，鹿有角而不能触。麋一名麋，青州人谓麋为麋。”《埤雅》：“麋如小鹿而美。”《说文》“麋”下段注：“麋异于麋者无角。”综上可知，麋似小鹿，无角，甲骨文𦥑作𦥑，正象麋形，是麋字之初文无疑，卜辞即用为麋兽名。麋和麋是𦥑的后起形声字。如果把𦥑释为子鹿之“麐”，把𦥑释为麋兽之“麋”，那么，麋之总名“麋”为什么要从麐从禾呢？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释“麐”说之误。

𦥑，各家释“麋”是对的，但𦥑并非麋兽本字。按照汉字结构规律分析，𦥑从禾，𦥑声，即稠之初文，本义当为束禾。《说文》“稠，𦥑束也”是束禾义的引申。后世从𦥑变为从鹿，是偏旁类化的结果，许氏遂不知其本义及从何得声而作出“从鹿、囷省声”的误说。《左传·哀公二年》：“罗无勇，麋之。”又《哀公八年》：“麋之以入，遂杀之。”杜预注并训麋为束缚。束缚亦是束禾义的引申。《韵会》“稠，亦作麋”是对的。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麋，假借为稠”，失之。其实，《说文》训“麋，麋也”，典籍或用麋为麋，才是假借。

至于唐兰先生说𦥑是“稠或穢的本字”，则是得失互见。因为𦥑既是麋的初文，则不当读为“麐”。麐字卫鼎作𦥑，借为镳。《说文》：“麐，麋属。从鹿，票省声。”《集韵·爻韵》以为麋的异体。今按，《说文》释义、析形及《集韵》的

^① 唐兰：《获白兕考》，载《燕京大学史学年报》，1932年第4期，转引自《甲骨文字诂林》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651、1652页。

^② 分见丁骕：《契文兽类及兽形字释》，载《中国文字》第21、22期，1966年；毛树坚：《甲骨文有关野生动物的记述——中国古代生物学探索之一》，载《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1期。